

我所知道的名人秘事丛书

WOSUO ZHIDAO DE MINGREN MISHI

他们是 怎样办报的

TAMENSHI ZENYANG
BANBAO DE

文 昊 / 编

一手
独家史料
亲历亲见
亲闻

说官说商 说权说钱 说名说利 说情说义 说文说武 说谋说计
——点击显要名流，细说鲜为人知的前尘往事
读成读败 读得读失 读起读落 读兴读衰 读浮读沉 读荣读辱
——聚焦人情世事，读懂命运福祸的因果缘由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名人秘事丛书

他们是 怎样办报的

文 昊/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们是怎样办报的/文昊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1

(我所知道的名人秘事)

ISBN 7-5034-1591-6

I. 他… II. 文… III. 新闻工作者-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8048 号

责任编辑: 于保政 封面设计: 孙少伟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北京雅龙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6.625 字数: 415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224 元 (本册定价 28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从历史细节读成败因由（代序）

“读史使人明智。”但这并不等于说，无论是谁，只要读一读历史，就一定都能变得“明智”起来。若要真正取得“读史使人明智”的效果，则必须对历史的认知达到“既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的程度。假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史实的了解不够全面、细致、深入，那就不可能从“史实”中得出正确、有益的“史识”。

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可见，历史是多层面、纵横交错、纷纭复杂、千变万化的，历史的发展演化是一种“合力作用”的产物，而要读懂历史并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经验教训，就应该尽可能走进历史的深处，多方面了解更多的历史细节。

说到“历史细节”，就必然涉及到过去的人和事——既包括已成昨日的人生，也包括已经发生的往事。事因人起，人以事存，人和事总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当然，作为历史细节的“人”和“事”，不是大而化之的“大事记”，仅仅提纲挈领地罗列出“某人在某时某地做了某事”，而是要说

出“某人为什么要做某事、具体是怎样做的、结果如何”等諸多具体而微的琐细之处。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的个性因素。

爱因斯坦认为：“如果不深刻研究科学创立者的个性发展状况，那就只能了解科学工作的一般内容，而不能理解这些工作是怎样成为可能的。”也就是说，每一项重大科学成就的产生，都是与创造了该成就的各位科学家自身的个性特征息息相关的。这个观点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无论从事什么行业的人，其成就大小乃至事业兴败，都同样能从他们的个性品质中找到答案。正因如此，所以在读史时就不能不注意考察各种人物的个性因素。

拿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各种人物的兴衰成败来说，无不与其固有的个性密切相关。比如，袁世凯和蒋介石都是心性狡诈、热中耍弄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既善于结党营私，也精于利害算计；既深知拥兵自重、以武力为后盾的重要性，也明了摆弄权术、玩弄他人于股掌之间的种种“韬略”。而世人在读有关他们的历史时，则大多只关注于他们“以阴谋起家”的一面，却忽视了其“以阴谋败家”的另一面；或者仅看到他们上台后“满朝朱紫贵，尽是一家人”的“空前盛况”，却无视于他们倒台时“树倒猢猻散，限来各自飞”的凄清落寞场景。一旦忽视某些重要的历史细节，就很难对历史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结果便会得出错误的历史经验，当然也不会变得更加“明智”。

又如，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应当算是北洋军阀中“执牛耳”的佼佼者，但其在反动阵营中却也并未做到“一呼百应”，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掀起了文争武斗。究其原因，除了段祺瑞个人迷信武力统一、刚愎自用等缘由外，还与他信任并重用徐树铮这个人有很大关系。以民初政坛上有名的“府

院之争”为例，这场政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总统府秘书长丁佛言与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之间的争斗：当时，府院之间的很多政务都不是通过黎段之间直接商榷、决定的，而是由丁、徐二人每日彼此洽谈沟通；然而，丁佛言是一个粗鄙无学、浅躁无识却又好大喜功、喜欢揽权自为的“十足官迷”，而徐树铮则是胆大量小、貌智心愚而又惯于煽风点火、搬弄是非的“小扇子军师”，这样两个负气逞才的著名好事之徒“狭路相逢”，怎能不兴风作浪，上演一出争权夺利的好戏呢？不过，在一般的历史书中却很少谈及这类情节，以至人们虽然大都知道段祺瑞有刚愎自用的性格，但却很少知道他还有“刚愎他用”的情形。

许多史书通常都是忽略细节的，然而，只有更多地关注历史细节，才能读懂历史背后的历史，洞察常情深处的隐情，进而体悟出人生世事或成功或失败的内在复杂因由，在品读历史的过程中逐渐使自己变得愈加“明智”。

司马迁说他著《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而这句话恰恰也从历史细节的角度点明了人生世事的兴败关键，就是“天”、“人”以及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效果。具体而言，也就是“天时”、“人为”、“人为与天时之间是否相得益彰”这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从根本上说，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要受其所处时代的总体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

“时势造英雄”这条客观规律，所体现的正是“天时”对于人事兴败的作用。因此，古人便有了“君子见机，达人知命”的感慨，孟子才会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镞基，不如待时。”所谓“时势比人强”，如果社会环境或组织环境没有给人们提供有利于施展才华的客观时势，或者客观时势虽然有利而个人却不知如何充分加以利用，甚至逆时势潮流

而动，那同样都会走向失败之途。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黎元洪之被举为民国总统，康有为之复辟失败等诸多史实，无不验证了这个道理。

其次，在同样的客观时势面前，不同的人之所以有成败之分，且其成败有程度大小之别，则是由于个人及其团体的具体状况所致。这就是决定人事兴败的“人为”因素。

杜牧有句诗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然而，这个说法只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客观时势，却忽视了人为因素——试想，如果把“雄姿英发”、智勇双全的周瑜换成胆小如鼠、只顾计较个人利害荣辱的张昭，那么即使客观时势再有利十倍，也同样逃不脱“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凄惨结局。可见，一味与世浮沉、俯仰由人而不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话，也不可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此外，无论“天时”还是“人为”因素，其对于人事兴败的影响最终必将体现和统一于二者之间是否能够相互为用、相得益彰。“天时”和“人为”因素的具体结合状况，通常决定了人事兴败的时间长短。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此新旧蜕嬗之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

中，新旧不同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从一定意义上说，陈寅恪先生说出了人事兴败的原因所在，尤其从短期来看更是如此。但正如美国思想家、政治家富兰克林所说：“你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同一个人，也能在同一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做到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一旦把观察的视角延伸到历史的长河中，则会发现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只不过历史的演变所遵循的是一条“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客观规律而已。

世无艰难，何来人杰？事实上，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沧海横流，才见壮士豪情。那些“不肖者”尽管颇有机巧，但却不免遭遇“速生速灭”的命运，在发迹之后不久就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而真正的“贤者”虽然笨拙一些，但他们的德行和功绩则会被世人永远铭记，终将彪炳史册。“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其理即在于此。

一般说来，由于历史本身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及其惯性等原因，使得“天时”与“人为”因素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常常会表现出一种“滞后现象”。正因如此，所以一些人总被浮华遮望眼，常常为了图一事之利而遗一世之害，逞一时之强而留百代骂名。这种“过把瘾就死”的想法和做法，其实是一种鼠目寸光和浅薄无知，既不给自己留后路，更想不到给后辈子孙留条路。

每逢社会转型期，由于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变化多端，故而人生命运就更加难以预料，且世事变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在此情况下，就使得上述“滞后现象”常常直接表现为

“现世现报”。这种情况，无疑更加有利于人们从简短、急速的历史变化中读懂人生世事的成败因由。

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四个最混乱的时代，一是“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二是儒学衰微、“名士”勃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是鲜讲廉耻、注重实利的五代十国时期，四是内忧外患、变乱频仍的清末民国时期。其中，尤以清末民国时期更被称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劫巨变”，这一段历史发展的曲折多变、纷纭复杂、五彩斑斓、多灾多难，更加呈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迷离之色。因此，对于这段时期的历史，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就给予了充分关注和高度重视。

1959年，周恩来给人民政协提出了一项新任务，那就是征集文史资料。当时，他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他还说：“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要勇于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从那时起到现在，人民政协所征集的文史资料数以亿字计，可谓汗牛充栋，洋洋大观。

概而言之，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的最大特色和优点即在于“亲历、亲见、亲闻”。其作者大都经历过近现代中国社会动荡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接触过诸多重要历史人物，有的作者本身就是名重一时的显要名流，他们不仅阅历丰富，而且来自各个方面，既有过去的军政界要人，也有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因此，他们以历史当事人的身份而做出的回忆，无疑可以补充、匡正历史文献的缺失与不足，有助于人们更加弄清历史的真实面貌。

同时，前人写史尤其是修“正史”时，或因顾虑见忌于

当道说“实”，或因担忧诟病于后人说“俗”，所以常常有意无意地隐去一些虽然琐细但却重要的情节而仅记其概要大略，并在彰否人物、点评事件时显得四平八稳，甚或故意多有溢美之辞，结果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所谓“正史”便成为清一色的“为帝王将相做家谱”了。相比之下，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则除了要求在内容方面尽量做到“求真写实”之外，在选材与写法上则往往可由各位作者自由选择，随意行文；即使对于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记述，常常也会采取杂糅多家、诸说并存的态度。再加上作者们都早已过了“不惑”、“知天命”之年而步入了花甲岁月，对人情世事的认识和感悟自然更加洒脱、透彻。所有这些，都有利于读者更好地辨别历史的真相，理清人事兴败的来龙去脉。

《我所知道的名人秘事》丛书，就是从这些文史资料中经过精挑细选之后编辑而成的。本套丛书选取的史料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中的典型人物及其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这些人曾经都是名人，他们或权倾当道，或名动一时，或雄踞一地，或富甲一方。当然，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官员，也有商人；有华人，也有洋人；有军人，也有文人；还有遁入空门的出家人……

虽然人们常说“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但实际上，人生并不总是梦，往事亦非都如烟。尤其对于那些发生在大动荡、大转折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生经历和纷繁世事来说，后人更需要多一些了解和认识。

当然，“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而且，由于不同人在思想、见识、立场、偏好、职业、家世、个性和人生阅历等各个方面存在差异，以及每个人所接触和关注的历史细节可能有所不同，因而在读史过程中往往也会品出不同的味道，悟出不同的道理。

比如，孔子读出了“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诸葛亮读出了“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唐太宗读出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王安石读出了“治大国如烹小鲜”，司马光读出了“君明臣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曾国藩读出了“内用黄老，外用儒墨”；胡适博士读出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鲁迅先生读出了历史“吃人”的一面；周恩来读出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毛泽东读出了“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观人必于其微，从小可以见大。读史之道亦然。若要从历史中得到更多的启发和教益，就应该从历史细节中读懂成败因由。

于保政

2005.1. 北京

目 录

从历史细节读成败因由（代序）（1）

遥领风气之先，挑战话语霸权（1）

当“新闻”和“报纸”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事业传入中国之后，办报之风便一度盛行。在各种各样的办报人中，除了一些抱残守缺、顽固不化、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守旧派之外，更多的则是持有新思想、新观念的维新派或革命者。尤其是那些胸怀远大抱负但却报国无门的人，更把办报作为实现自我理想的间接手段。由此，在中国近代史上便演出了一幕幕以“争夺话语权”为中心意旨的历史活剧。

在舆论批评被统治者视为禁脔的时代里，要想办好报纸不但需要先进的思想和高超的智慧，而且更需要敢于对抗强权的无畏勇气。毛泽东曾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思想先驱们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既包括他们“敢为天下先”的革故鼎新精神和不畏强权的不屈意志，也有从事报业经营的编辑方法和管理技巧。

首创北京第一家民间报纸的彭翼仲（1）

章士钊主笔《苏报》始末（29）

- 从陈纪怀办《天铎报》说到“竖三民报”…………… (34)
《申报》与史量才…………… (41)
刘仰乾与北京的第一家晚报…………… (50)
邵力子与《民国日报》…………… (61)
胡惠生与《文汇报》…………… (65)
成舍我其与《北京世界日报》…………… (76)
成舍我创办上海《立报》的前前后后…………… (105)

一代名记几多风雨,以笔为枪舍死忘生…………… (113)

“不平则鸣”乃是人之常情,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种论调,在中国社会里可谓长盛不衰,尤其在统治者的头脑中更是大有市场。历朝历代的绝大多数当权者都不能“从谏如流”,而是极度惧怕听见批评的声音——从周厉王发明“腹诽”罪令人道路以目,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使人喑若寒蝉,再到清王朝大兴“文字狱”导致万马齐喑,此类事例简直俯拾即是,数不胜数。

在清末民初掌握大权的统治者,堪称集缺德、无能、卖国、腐朽等种种劣性恶德于一身的典型,因而在镇压舆论时更是残忍血腥,无所不用其极。但尽管如此,“敢为民众鼓篋”的记者仍然屡有出现,他们以笔为枪,甘愿以生命为代价对妄图独享“话语霸权”的反动统治者进行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

正如古人总结秦王朝短命而亡时所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统治者想方设法钳制舆论的结果,不但没有消解人们的对立情绪,反而促使自身更快走上了覆亡之路。当统治者压迫

或杀害敢说真话的人之后，他们自己也无一例外走向了灭亡。

“因报而生，为报而死”的一代报人邵飘萍…………… (114)

“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林白水遇难前后…………… (137)

以“新闻救国”为终生理想的史量才…………… (169)

史量才被军统特务暗杀的真相…………… (181)

罗隆基在天津《益世报》的风风雨雨…………… (189)

透视报业“金字招牌”，品评巨头办报之道…………… (208)

《大公报》是旧中国创刊较早也比较重要的报纸之一，该报的创办人是怀有维新思想的满清贵族英敛之，因其办报主旨最初是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故在辛亥革命后便迷失方向，不久易手于北洋军阀安福系头目王郅隆，安福系败后该报亦停刊。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大公报》，此后该报开始蒸蒸日上，逐渐成为旧中国报界一块难得一见的“金字招牌”。

《大公报》的发展壮大，主要得益于胡政之、张季鸾等报业巨子的用心经营。毛泽东曾对他们的办报经验予以肯定，他说，虽然《大公报》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作用是“小骂大帮忙”，但张季鸾手摇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毛泽东认为，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报上登的文章很有些内容，所以他在延安时就经常看；而且，《大公报》还培养了一批精通采编的青年人才。

“英敛之这个人”与旧《大公报》“这个报”…………… (209)

“三巨头”接手《大公报》，“哼哈二将”经营有道	(247)
张季鸾、胡政之和《大公报》研究部	(266)
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	(273)
总揽《大公报》全局的新闻巨子胡政之	(288)
“敢捅马蜂窝”的《大公报》主笔王芸生	(322)
我四进四出《大公报》的经历	(357)
我所知道的《大公报》内情种种	(374)
国民党查封重庆《大公报》的真相	(385)

官样文章千篇一律，争权夺利不一而足	(389)
-------------------------	-------

与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相比，国民党可以说更懂得报纸的作用，蒋介石政权曾经先后办过许多官方报纸，作为宣传反动政策的“喉舌”。然而，这些官方报纸虽然拥有政治靠山和经济实力，但却毫无实际价值和发展前途，并未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报界主流。

这种情况，一方面固然是由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负责这些官方报纸的人不仅是无能之辈，而且他们办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利益。形形色色的官报，不但没有真正起到“喉舌”的作用，反而成为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舞台。

《中央日报》从“先日报后中央”到“先中央后日报”的转变	(389)
-----------------------------------	-------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内的权力争斗及“先天下之溜而溜”的内幕	(407)
-----------------------------------	-------

黄少谷是怎样借助《扫荡报》得宠“党国”的	(423)
----------------------------	-------

取名“和平”、鼓吹内战的《和平日报》	(431)
--------------------------	-------

我所知道的《东南日报》的兴衰	(437)
蒋介石面谕“永远停刊!”的“CC 喉舌”——上海《晨报》	(455)

洋人办报洋相百出，“不偏不党”另有阴谋 (477)

在近现代中国新闻与报业领域中一直活跃着的各种力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足鼎立”的格局：除了民报、官报之外，洋报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支力量。尤其在舆论遭受钳制的清末时期，即使中国人自办的报纸也必须“挂洋旗，卖中文”，否则就无法逃避官府的压力与迫害。

这种局面，在辛亥革命后则大为改观，此时真正归外国人掌握的报纸只有一家《新闻报》。而且，以一个外国人而历经时代变迁仍能长期管领中国报纸的，也只有《新闻报》的主人福开森。他在办报之初就主张采取所谓“不偏不党”的方针，并经常以此自我夸耀。但从福开森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实际上是另有一番盘算和阴谋的。

《新闻报》是怎样发家的	(477)
“历久不衰”的福开森与《新闻报》	(498)
我所知道的福开森在华勾当	(505)

遥领风气之先，挑战话语霸权

当“新闻”和“报纸”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事业传入中国之后，办报之风便一度盛行。在各种各样的办报人中，除了一些抱残守缺、顽固不化、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守旧派之外，更多的则是持有新思想、新观念的维新派或革命者。尤其是那些胸怀远大抱负但却报国无门的人，更把办报作为实现自我理想的间接手段。由此，在中国近代史上便演出了一幕幕以“争夺话语权”为中心意旨的历史活剧。

在舆论批评被统治者视为禁裔的时代里，要想办好报纸不但需要先进的思想和高超的智慧，而且更需要敢于对抗强权的无畏勇气。毛泽东曾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思想先驱们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既包括他们“敢为天下先”的革故鼎新精神和不畏强权的不屈意志，也有从事报业经营的编辑方法和管理技巧。

1

遥领风气之先，挑战话语霸权

首创北京第一家民间报纸的彭翼仲

前 言

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一提到“彭